

1-12

# 中國大陸宋文研究綜論 (1979-2006)

Mainland Chinese Research on Song Literature (1979-2006)

陳友冰 (Chen Youbing) \*

20 世紀上半葉，有關宋文的專門論著寥若晨星，50 年代到 70 年代數量相對多了一些，但與政治運動配合色彩太濃，往往集中於「關心民生疾苦」、「體現愛國主義精神」的少數名家、名篇，而且研究方法單一，研究觀念陳舊，只有像王安石、李清照等少數名家由於當局的關注和有意識的提倡，其別集整理得以一支獨秀。到了 70 年代末，大陸進入改革開放時期，這種蕭疏冷落的局面才真正得以突破。據統計，改革開放後關於宋代文學的研究專著和別集整理已達百部（不包括選本），其中如《宋代文學通論》、《兩宋文學史》、《宋代文學思想史》、《宋代文學史》、《宋金元文學批評史》、《宋代散文研究》、《唐宋駢文史》等，<sup>1</sup>上述的宋代文學通論對宋文尤其是南宋文的研究皆有所加強，對其地位和價值的評估也大大提高，《宋代散文研究》更是到目前為止的唯一一本宋代散文專著。在研究論文方面，從 1979 年到 2000 年這二十年間，專題論文（不包括選文或賞析）已達 120 多篇，被重點關注的宋代文學家已達二十多位，這大大超過 20 世紀的前八十年，而且在研究觀念、研究方法和研究深度上也非前八十年可比。

## 一、宋文總集和別集、整理

20 世紀整理出版的宋人文集近 100 種，與《四庫

全書》所輯的 128 種宋人別集相差無幾，其中近二十年整理出版的宋集超過前八十年的總和，而且不再止於點、校，諸如箋注、編年、譜、傳、敘、記、述論等現代文獻整理專案大大增加，由於社會安定和海外學術交流的加強，文獻資料搜集更為完備，整理的水平也大大提高。

### （一）總集整理

20 世紀宋人總集的整理始於 1914 年李之鼎編選的《宋人集》，稍後則有胡敬思刊刻的《豫章叢書》，此後直至 20 年代中葉約七十年間，大陸再沒有編印過宋人總集。<sup>2</sup>直到改革開放開始後才有《全宋文》的編輯出版。《全宋文》由曾棗莊、劉琳主編，1985 年開始編纂，1988 年起陸續由巴蜀書社出版，收錄宋文 10 萬餘篇，涉及作者一萬餘人，總計 100 冊，5,000 萬字（後 50 冊尚未面世），可以說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宋文全集。該書因人繫文，並附作者小傳。文有標點，間有校記，且注明文章出處。書末附全書總目、作者索引、篇名索引、疑偽互見作品對照表、宋人文集版本目錄、別集以外引用書目等，為研究和提供極大方便。但由於編纂周期過短和參加的人多，也出現許多疏漏，參編者李文澤把此歸納為「文章誤收」；作者「按不同稱謂分列多處，而實屬同一人的作家，也有同

\* 本文以 1979-2006 做為主要的研究時期，即以 1979 年大陸進入「改革開放」後做為開始。

\*\* 作者現為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海峽兩岸唐宋文學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1 王水照主編，《宋代文學通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張毅，《宋代文學思想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孫望、常國武主編，《宋代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顧易生、蔣凡，《宋金元文學批評史》（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楊慶存，《宋代散文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于景祥，《唐宋駢文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

2 其間「臺灣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曾於 1967 年出版方遠堯編纂的《宋文彙》。

名」；「重收的文章自然也多，須認真復查」；「蒐羅佚文是《全宋文》的一大功績，但是否確屬佚文，就需要核定該文在作家文集中是否已經收錄」幾個方面。<sup>3</sup>整理《全宋文》的過程中還衍生了系列產品，計有：《宋文紀事》、《現存宋人著述總錄》、《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補編》、《宋人別集敘錄》等。<sup>4</sup>

改革開放後還重印了兩部宋人總集：1.《宋文鑒》（中華書局，1992）150卷，宋人呂祖謙編，為詩、賦、文合編的總集。其中收詩1,020首，賦80篇，文1,400篇，主要是北宋人文章。2.《南宋文苑》（中華書局，1994），70卷，收錄南宋作家300人的賦40多篇，詩1,100多首，文40多篇，可以看作是《宋文鑒》的續編。由林邦均、趙仁珪加以點校。

70年代後期還出版了一批分文體的宋人總集：中華書局自1978年起出版一批唐宋人筆記四十多種，其中宋人筆記三十多種。點校之外另有「前言」，包括作者介紹、該書內容、思想藝術價值、版本源流等相關情況。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出版了宋元筆記叢書和影印四庫筆記小說兩大系列。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年出版唐宋小品十家，其中宋代五家：歐陽修、蘇軾、王安石、陸游、劉克莊。另外，上海師大古籍所正在編纂另一大型總集《宋人筆記》。

## （二）別集整理

80年代整理的宋人別集達八十多種，為20世紀前八十年總和的四倍，而且呈現一些新的特點：

一是傳統的箋注傳疏之學，開始以現代文獻學方式出現在宋文整理之中：編年箋注、傳論、敘論等文獻

綜合研究取代了單一的箋注或年譜，如朱東潤《梅堯臣集編年箋注》，徐規《王禹偁事迹著作編年》，徐兆文《李清照全集評注》等，<sup>5</sup>其中朱著將梅堯臣全部詩文重新編年，並將梅氏逐年遭遇列於當年作品之前，使年譜與作品密切結合。在箋注方面，以夏敬觀《梅宛陵集校注》為基礎，在作品年代考證方面作了大量補注，對詩文涉及的人物作了詳細箋釋。在校勘方面沒有沿用夏敬觀採用的宋本，而是以殘宋本和萬曆本為底本，校記中保留夏敬觀、朱祖謀諸家之說並附己見。可以說集中了數十年來梅堯臣研究的主要學術成果。徐著則幾乎將王禹偁的全部詩文進行了編年，鈎沈輯錄了許多散佚詩文，並對《小畜外集》內誤收的詩歌進行考證，補正了文集內脫漏和誤刊字句。

二是一些點校本底本選用較精，參校資料廣泛，集佚成果豐富，並多有前言或後記。這當然與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的安定、經濟的繁榮，尤其是海內外交往的頻繁方便有很大關係。如沈文倬校點《張載集》、《王令集》，徐鵬《于湖居士文集》，吳書蔭、金德厚《陳與義集》，陳杏珍、晁繼周《曾鞏集》，孔凡禮《增訂湖山類稿》、《蘇軾文集》，王獻唐《雙行精舍校汪雲水集》，曾棗莊、馬德富《欒城集》等。<sup>6</sup>這些點校本多擇善本為底本，並以多種版本以及總集、別集以及地方誌等文獻資料參校，書後亦多附有作者生平、著作版本和歷代詩文評輯錄等文獻資料，並寫有「前言」或「後記」，介紹作者生平、思想創作情況，詩文主要成就和著作版本流傳情況，其學術含量豐富，見解穩當之中亦見精深。如徐鵬《于湖居士文集》以《四部叢刊》影印慈溪李氏藏宋刊本為底本，校以宋

3 北京：中華書局主編，《文獻》1999.1。

4 曾棗莊主編，《宋文紀事》（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5），劉琳、沈治宏，《現存宋人著述總錄》（成都：巴蜀書社，1995），李國玲編纂，《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補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99）。

5 朱東潤，《梅堯臣集編年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徐規，《王禹偁事迹著作編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徐兆文，《李清照全集評注》（濟南：濟南出版社，1990）。

6 沈文倬校點，《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王令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徐鵬，《于湖居士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吳書蔭、金德厚，《陳與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陳杏珍、晁繼周，《曾鞏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孔凡禮，《增訂湖山類稿》（北京：中華書局，1984），《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王獻唐，《雙行精舍校汪雲水集》（濟南：齊魯書社，1984）；曾棗莊、馬德富，《欒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乾道本《于湖先生長短句》，《宋名家詞》本《于湖詞》、《百家詞本》中的《于湖詞》，雙照樓校寫本《全芳備祖詞鈔》、《永樂大典》等。凡有校改處皆有校記。書前有「前言」，介紹張孝祥的一生建樹、革新主張和政治遭遇以及在詩詞文章中的表現，創作風格和歷史文學地位，可以說是新時期第一篇「張孝祥論」。陳杏珍、晁繼周《曾鞏集》的「前言」則主要介紹了曾鞏的散文成就和版本流傳、校刊情況。從「長於敘事」、「說理透闢」和「善於運用歷史故事」等方面來析論曾鞏的散文風格。然後從現存最早的《元豐類稿》元大德八年東平丁思敬刻本起，至清康熙三十二年南豐人彭期刻的《曾文定公全集》，細數歷代版本流傳的情況，評點得失。最後開列參校的 14 種版本和校勘的標準、經過。在不太長的〈前言〉中學術含量非常豐厚。

三是過去不太受到關注的中小家別集也陸續整理出版。新時期以來，不僅一些名家別集以各種版本不斷刊行，一些以前不太受到關注、很少有人研究的中小家如張詠、蘇頌、張先、余靖、張方平、韓琦、石介、李覲、蔡襄、王十朋、張耒、蘇過、朱淑珍、宗澤、胡寅、張元幹、葉適、謝枋得、鄭樵、李昂英、林景熙、汪元量、劉辰翁、鄭思肖等人的別集也開始整理出版。其中有的還不止一家出版社出版。<sup>7</sup>北宋前期的五位名臣張詠、余靖、張方平、韓琦、蔡襄就由中華書局、上海古籍、中州古籍、天津古籍、巴蜀書社、福建人民六家出版社在 20 世紀末幾乎同時推出。這些中小家別集的研究和整理出版對宋文研究乃至宋代文學研究向深廣推進無疑是大有益處的。

四是一些研究資料和工具書也相輔而行。這是中華書局繼 20 世紀 60 年代的《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之後陸續推出的一項長遠規劃，計有《黃庭堅和江西詩

派卷》，《蘇軾研究資料彙編》，《歐陽修資料彙編》等。<sup>8</sup>這些研究資料搜羅甚富，為研究者提供了不少方便。

此時期的宋文別集整理也存在若干問題和不足之處，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一是別集的整理本與宋人別集的數量還不成比例，數量相當大的宋人別集還有待整理。宋代在歷史上有專集的詩人達 600 多家，而 20 世紀只整理不到 100 家，佔總數的六分之一。其中一些一流大家如歐陽修、王安石、黃庭堅的文集都沒有箋注、校釋本，二、三流中小家的別集更是如此。另外，據傅璇琮、孫欽善等主編的《全宋詩》70 冊「正編」，宋代有詩人 9,300 多家，詩作 20 多萬首，這還不包括冊數與此相當的「補編」，因此新的別集搜集整理工作更為繁浩。二是已出版的宋人別集整理本還存在校刊不精、輯佚不全的弊端，如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的《臨川集》，由於出版時龍舒本影印本尚未問世，漏收、誤收者較多，沒有說明和附錄，點校也較為草率，90 年代整理出版的一些中小家集也存在類似情況。三是別集整理中，以編年箋注、傳論、敘論等綜合研究方式進行文獻整理者還不夠普遍，採用現代電腦技術進行相關統計和分類檢索系統在別集中還沒有得到實際運用。

## 二、宋文總論和分段研究

宋文總體研究涉及宋文尤其是南宋文的地位、研究狀況、風格特徵、繼承創新以及發展流變等諸多問題。

### （一）宋文價值的重估和研究取向

改革開放後出版的宋代文學總論通論和文學史，對宋代散文尤其是南宋文的研究皆有所加強，對其地位和

7 如汪元量的文集有：孔凡禮，《增訂湖山類稿》，王獻唐，《雙行精舍校汪雲水集》（濟南：齊魯書社，1984）；蔡襄文集有：吳以寧點校，《蔡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蔡襄全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陳與義集則有：吳書蔭、金德厚點校，《陳與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白敦仁箋校，《陳與義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8 《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齊治平編，《陸游》（北京：中華書局，1962）、湛之編，《楊萬裏、范成大》（北京：中華書局，1962）；傅璇琮編，《黃庭堅和江西詩派》（北京：中華書局，1978）；四川大學中文系，《蘇軾研究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4）；洪本健編，《歐陽修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

價值的評估也大大提高。這些專著皆分章設節對宋文的特徵、成就、分期、流變和代表作家進行述論。王水照在《宋代文學通論》「後記」中指出：宋代文學研究格局上有「重詩詞輕散文，重北宋輕南宋」的傾向，呼籲要著力加以改變，他本人對此也是身體力行：早在20世紀60年代他就發表過兩篇關於宋代散文的專論，新時期開始後，王氏又陸續發表〈宋代文學的時代特點和歷史地位〉、〈文體丕變與宋代文學新貌〉等數篇論文，<sup>9</sup>再次強調宋文的文學地位，加強對宋文尤其是南宋文的研究。以上觀點在其主編的《宋代文學通論》中體現的更為充分：該書用了兩章篇幅對宋文的特徵、繼承、發展、流變加以整體考察，其中「宋文流派繹述」考察了兩宋散文整個發展流程，對散文作家和流派作了清晰的梳理；「宋文題材與體裁的繼承、改造與開拓創新」則從整體上探究宋文體式創新的時代基因和宋代文人的體裁意識。<sup>10</sup>

程千帆先生曾呼籲加強對宋文的各種文體尤其是駢文和小品文的研究，他說：「研究者文學史家幾乎從來不談興盛於唐代而發展於宋代的四六文，對宋代那麼多散見於筆記中的小品文也不屑一顧，好像它們並不存在，這實在是可驚的」。<sup>11</sup>在他和吳新雷合著的《兩宋文學史》中，這種現象得到了很大改觀：此書以時代為序，兩宋散文、駢文隨時皆得到論說，尤其加強了對駢文、小品文和南宋散文的論述，如南宋散文的各種流派、各種文體、文章理論、文章選本和文章流變皆得到較為詳盡而清晰的論述和梳理，其中有不少矯俗之論，如對宋四六文，論者多持否定態度，認為「宋四六」多為官樣文章，「有識者視為俗吏簿書，不復致力」。程氏在該書中則專設「宋四六」一章，認為：四六文在宋代已發生變化並形成自己的獨特面目，「許多本來就以散文見長的作家們，在寫四六時，注入了古文的氣勢，

加添了古文的長句，也常常使用唐陸贄所擅長的白描直敘來代替徵故數典，顯得語言流暢清新，使其作品出現了與他們前輩頗不相同的風格。所以宋四六中，也往往有很吸引人的篇章和精彩奪目的片斷」。郭予衡是國內專治散文史的專家，他的《中國散文史》<sup>12</sup>（中冊）第五編為「宋遼金元」部分，共十四章30餘萬字，是散文史著作中宋文論述最備的一種。楊慶存《宋代散文研究》<sup>13</sup>是到目前為止的唯一一本宋代散文專著。全書分為十章，前兩章是總論散文的文體特徵、發生時間、研究範圍和音樂界標，第三、四和九、十章是宋文總論，涉及宋文歷史地位、繁榮原因和體裁樣式的開拓創新等諸多問題，在研究觀念、研究方法和研究結論上皆有可圈點之處，例如第四章「宋文繁榮的表象景觀和深層底蘊」，從標題上即可看出作者不滿足於一般的繁榮現象的羅列，而是著重探討形成這種繁榮局面的深層原因。作者果然從「多元並存與整合驅動」的運行機制；「群體創作和流派型衍傳的發展模式」；「崇文意識與文化氛圍的社會環境」和「知識結構與群體意識的創作主題」四個不同角度進行深層探討。就是對宋文繁榮的現象羅列時，作者也注意採用現代的統計學方法進行量化處理，此節標題就是「作家投入和作品產出：數量統計及其圖表顯示」，在統計角度和方法上也頗有獨到之處。

## （二）宋文總體研究

主要涉及宋文的地位、特徵及其形成原因等方面的探討。朱迎平指出：「無論從體裁的完備、流派眾多、藝術技巧的成熟等方面來衡量，宋代散文確處於我國古代散文發展的一個巔峰階段，是不應該被輕忽的。」<sup>14</sup>楊慶存認為「宋文的鼎盛首先表現在創作方面。宋代散文作家總數與創作總量、名家與名作的數量、個體作家

9 王水照，〈宋代文學的時代特點和歷史地位〉，《文史知識》，1983.10、〈文體丕變與宋代文學新貌〉，《中國文學研究》，1996.4。

10 這兩章的執筆者為王水照的弟子楊慶存。

11 〈宋代文學研究隨想〉，《文學評論》1983.6。

12 郭予衡，《中國散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3 楊慶存，《宋代散文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14 朱迎平，〈宋文發展整體觀及南宋散文評價〉，《復旦學報》1998.4。

的創作數量等等，都是空前的，前此歷代均無法相比並。宋人在題材方面的發展創新，在內容方面的開拓發掘，也都遠過前人。宋人在藝術方面的發展創造更具特色。宋文的藝術風格多姿多彩、豐富多樣，其於用駢用散雖有過激烈的爭論，文風復古的呼聲甚高且貫徹於兩宋間，但駢、散二體均獲得了大面積的豐收。宋人在散文創作理論和散文批評理論諸方面的總結和研究，也開始向全面、系統、深入、細緻、多視角、多層次的方面發展，自宋初迄宋末，不僅有著大量的片斷式論述，而且出現大量的專文、專論或專書。「特別是宋人有著鮮明的群體意識，不同的創作傾向，不同的審美標準和不同的藝術趣尚，使他們分別形成了眾多的創作團體和不同的藝術流派。這些群體和流派，相輔相成、交相輝映，共同創造著宋文的繁榮鼎盛，構成了宋文發展的奇特景觀」。<sup>15</sup> 章明壽認為唐宋散文的區別是：「唐文縱橫開合，波瀾起伏，無數高峰突起；宋文曲折紆徐，鋒芒隱現，一片明月如洗」。<sup>16</sup> 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唐文氣勢磅礴，宋文理性綿渺；唐文簡古嶄截，宋文豐厚鋪排；唐文旨意嚴謹，宋文題材廣泛；唐文錘煉精緻，宋文明白如話。孫望、常國武則從宋代幾個帶有自身特點的歷史背景來分析宋文特徵的形成原因，如在分析宋代「出現如此眾多氣勢充沛、說理透闢、文字流暢的政論散文」時，就認為是由於宋代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比前代嚴重，使得許多有責任感的士大夫深感危機深重，迫切要求變革。他們不僅見諸行動，而且奮筆為文。「為求說理明晰、論證有力，文字風格就必須變艱澀險怪為平易暢達」。宋的重視文化建設，文化氛圍濃厚，這就使得總體上宋代的知識分子在學識的廣度和深度上超過前代。「許多作家之所以能在他們的作品中創造性博采廣收前人文學之長，大量而熟練的運用古書中的成語典故，不管是敘事、抒情、議論，都能做到筆之所

至，曲隨人意，就是建立在這一堅實基礎上的」。<sup>17</sup>

鄭永曉〈本世紀宋代詩文別集整理的成就與不足〉，張海鷗〈宋文研究的世紀回顧與展望〉則是關於宋文的近現代研究史方面的專論。<sup>18</sup> 鄭永曉文回顧了20世紀宋人總集、別集的校勘、輯佚和注釋方面的成就和不足。指出「別集整理本所占的比例還比較小，不少大家如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的別集尚需整理校釋」；<sup>19</sup> 「已經整理出版的宋人別集中，還存在著校勘不精、輯佚不全的缺點」；除「幾個別集之外，宋代詩文別集多沒有現代注釋本」。作者指出：「與唐代詩文研究相比，宋代詩文研究在質量和數量方面還存在一定的差距。筆者以為造成這種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基礎工程的落後，極大的制約了研究的拓展和深化。這種基礎工程是指詩文總集的編纂與別集的校勘、標點、輯佚等」。張海鷗文將新時期宋文研究的成就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研究者增多，研究方面拓展，研究成果大量增加。「據人大複印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收載情況統計，近二十年間宋文研究者大約有70多人，論文100多篇」；二是名家熱點研究的深入。歐陽修、蘇軾等名家研究，「就內容而言，涉及文本、文體、文法、文格與人格等；就方法而言，有比較研究、影響研究、人學與文學研究等」；三是「研究觀念的改變」。「王安石的文章在不同時期受到不同關注，最能說明20世紀研究觀念的變化」。作者也認為，上述情況與其說是宋文研究初步繁榮，毋寧說剛剛起步，與宋詞、宋詩研究相比，弱勢還很明顯。作者指出六個努力方向：1. 宋集整理工作需要持續不斷的投入；2. 宋文與前後代文章的關係、影響研究、異同比較研究，大有文章可作；3. 研究方法和研究觀念有待更新；4. 應關注不同文體間的聯繫和相互影響；5. 應進行比較系統研究，如作品形式學、文法學、文體史、文體學史等；6. 譜傳學、

15 《宋代散文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頁49、50。

16 章明壽，〈從韓愈歐陽修作品看唐宋散文風格之異〉，《文學評論叢刊》第18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17 孫望、常國武，《宋代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頁4-6。

18 鄭永曉，〈本世紀宋代詩文別集整理的成就與不足〉，《文學遺產》1994.3；張海鷗，〈宋文研究的世紀回顧與展望〉，《文學評論》2002.3。

19 鄭永曉寫此文時，孔凡禮點校的《蘇軾文集》和《蘇軾詩集》尚未出版。

研究史、重要作家研究資料彙編、版本目錄學等都需要加強。

### （三）宋文分期分段研究

楊慶存《宋代文學研究》將兩宋散文分為五個時段：1.北宋前期散文。從宋開國到歐陽修釋褐（960-1030），時間為七十年，又可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代表人物為柳開、王禹偁，後一階段代表人物為穆修、石曼卿、尹洙、蘇舜欽等。2.北宋中葉散文。從歐陽修登進士的到蘇軾逝世（1031-1101）為第二期，歷時八十年。其間亦可以神宗熙寧四年（1070）歐陽修致仕歸隱禍蘇軾出知杭州為界，分為前後期，各四十年，由歐、蘇次第主盟文壇。此是古文一統天下時期，也是宋代散文發展的顛峰期和鼎盛期，也是中國古代散文發展史上最輝煌時期。3.南渡前後期散文。自蘇軾逝世到李清照逝世（1101-1155），為五十五年，亦可以南宋立國（1127）為界分為前後兩段，其間以李清照為代表的「窮極華麗」的文采派和以宗澤、胡銓為代表的「剛大憤激」的抗戰派散文。4.南宋中興期散文。從李清照逝世到真德秀逝世（1155-1235），時間八十年，期間又可以陳亮逝世（1194）為界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各四十年。這是宋文發展的又一繁榮期。5.宋代散文終結期。從真德秀逝世到南宋滅亡後文天祥就義（1155-1283）。<sup>20</sup>

王綺珍〈南宋散文評價中的幾個問題〉<sup>21</sup>是20世紀最早的一篇南宋散文專論。文章將南宋文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南渡初期，因和戰之爭而產生一批十分精彩的論辨散文，代表人物為宗澤、胡銓、李綱等，特點是「既富於鼓動性，又富於邏輯性，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較之北宋大家刻意為之的策論，在藝術成就上有過之而無不及」。第二階段是南宋中葉，這是南宋散文的主體階段。代表人物分為兩類：一是以陸游、陳亮、辛棄疾、葉適為代表的功利派；一是以朱熹、真德秀為代表的理學派。這一階段的特色是亢奮與冗弱、精

警與汗漫並存，作家多是文士，創作更帶有文人的自覺性，文章也更講究章法、敘事性作品增多，雖冗漫者不少，但也不缺乏精品。其中從「理學派」分出的以呂祖謙為代表的論文一派，既以文貫道，又講究章法，「在南宋一朝，這一派實際是唐宋古文的嫡嗣和正宗」。第三階段是南宋末年，代表人物為文天祥、鄭思肖、鄧牧等。其特色是多寄寓不甘亡國的壯烈意氣和黍離之悲，「內容多集中於記寫對社稷傾亡之後的深刻反思，風格上也一改功利派質樸靜重與論理派的典雅冗散，顯得特別懇切、沈鬱與悲壯」。朱迎平〈論南宋散文的發展及其評價〉<sup>22</sup>將南宋散文的發展劃分為四期：1.過渡期：高宗建炎、紹興年間（1127-1163），約30年。此時論政言事成為的散文創作的主體，和戰之爭成為大部分文章的中心。議論文極為發達，記敘、抒情之文沒有受到充分重視。此時作家為文皆有典型但缺少大家；2.中興期：孝宗隆興初（1167）至寧宗嘉定末（1224），約60年。表現為名家薈萃，文派孳生，文論勃興，代表人物有張孝祥、呂祖謙、陸九淵、朱熹、陳亮、楊萬里、范成大、辛棄疾、陸游、葉適等。此時各類文體全面繁榮，同時衍生出不少文派，如朱熹等的道學派，陸九淵的心學派，呂祖謙的文章派，葉適的永嘉文派等；3.衰落期：理宗寶慶初（1225）至度宗咸淳末（1274），約50年。此時主要傾向有二：一是理學家論道說理文更為泛濫，甚至影響到應試文體，成為新的「時文」；二是為矯正理學時文之弊，以古奧艱澀為特徵的變體古文也頗有市場，再加上四六表啓之類應酬文字泛濫，宋文走向衰落。此時能堅持宋文優良傳統的是永嘉文派。4.終結期：帝昺德祐初（1275）至帝昺祥興二年（1279），約40年。此時的特徵是抗亡志士和南宋遺民共同譜寫宋文悲壯尾聲。代表人物有文天祥、劉辰翁和鄭思肖等。

關於北宋文的評價，郭予衡在〈北宋文章的兩個特徵〉<sup>23</sup>一文中將北宋文概括為兩大特徵：一是長於議論。北宋作家的各種文體中，幾乎都難以議論，不僅好寫政論和史論，甚至紀遊之文也不寫風景而專門議論。

20 《宋代散文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21 王綺珍，〈南宋散文評價中的幾個問題〉，《文學遺產》1984.4。

22 朱迎平，〈論南宋散文的發展及其評價〉，《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01.1。

23 郭予衡，〈北宋文章的兩個特徵〉，《社會科學戰線》1985.3。

所謂文以明道、文以明理，是宋人習以為常的看法，所以北宋文章多論道、論政和論兵之作；二是平易自然，這是藝術上成熟的一個標誌。楊慶存〈論北宋前期散文的流派與發展〉<sup>24</sup> 論述了北宋文的價值和發展流變，指出宋代是中國古代散文發展史上的又一輝煌時期，不僅大手筆雲集，名作如林，作家作品數量遠過前代，而且藝術流派層見疊出，競闢新境，形成了宋文的繁榮景觀。而北宋前期是直接影響有宋一代散文發展的重要起步階段。羅立剛〈論歐蘇文人集團對「文統」建設的貢獻〉<sup>25</sup> 是篇關於北宋文論的專論。作者從文人群體以及唐宋「道統」與「文統」著眼，指出宋人文統觀的確立，使宋代文學批評形成了辨體派、重法度的特色。

關於南宋文的評價，王綺珍〈南宋散文評價中的幾個問題〉認為前人鄙薄南宋散文，主要是認為它「文氣冗弱」。作者認為這種冗弱確實存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不復有漢唐的氣魄及唐宋大家的扛鼎筆力；二是章法往往有失嚴謹，敘事也顯得汗漫拖遝」。產生冗弱之弊既有社會政治和士人思想心理方面的原因，也有散文自身的因素，這是宋人追求平易自然而帶來的消極結果。但作者也認為：「南宋各種體裁的藝術成就並不均衡，大致來說，記敘性文字尤其是碑誌比較散漫萎弱，而議論文字最為明達，在一定程度上還超過了北宋」，「南宋散文成就最高的多集中在扶危救傾的議論之中，而不是敘事性作品，更不是理學家的議論性文字」。郭予衡在〈南宋詩文的時代特點——《南宋文範》點校本序言〉<sup>26</sup> 一文中認為：「南宋之文最富有時代特點的，是抗戰救亡之文。論政、議兵，是主要內容」。其中辛棄疾的《美芹十論》、《九議》等，「代表著南宋中期政論文章的最高水準，也最有南宋之文的時代特色」。作者認為，南宋文章之可訾議者，主要是「講學」之文。這類文章又可分為「談心性」和「講事

功」兩派。談心性的是道學家之文，以朱熹為代表；講事功的作家以陳亮和葉適最為有名，其文章以評論時事和講治亂興衰為特色。朱迎平〈論南宋散文的發展及其評價〉亦認為在散文史研究中，整體輕視、低估南宋文的偏見，不能再繼續下去。作者認為，南宋散文的成就不容低估：一方面，它繼承和鞏固了北宋大家奠定的宋文優良傳統，並使之發揚光大；另一方面，它在北宋散文的基礎上有所開拓，表現出一些新的面貌和特徵。這些特徵具體表現在：1. 民族危亡的環境，孕育出一批充滿愛國激情的篇章；2. 對各類文體的開發更為全面：序文、雜記、題跋、碑誌、文賦、遊記諸體，在題材、格局、表現手法都有所拓展，並進一步發展了日記、筆記、詩詞文話等著述體裁。文章也指出，一部分南宋文確實存在著「冗弱」的弊病，造成其弊病的原因與日趨衰微的國勢有關；也是宋文整體化趨於內斂自省、重理節情的一種表現。作者在〈宋文發展整體觀及南宋散文評價〉一文中，對於南宋散文的成就，又增加兩點：一是繼承鞏固了北宋大家奠定的平易流暢的宋文優良傳統，並使之發揚光大，始終佔據文壇統治地位；二是從創作實績來看，南宋散文從數量到質量都不可忽視。數量上今存宋人別集 700 多部，其中北宋作家 200 部，南宋 500 部；從質量上看也是名家薈萃，風格多樣。

### 三、宋文分類研究

改革開放後的宋文分類研究雖涉及各種文體，如記體散文研究，駢文和宋賦研究，題跋、詩話體研究等，也出現一些代表性的論文，如楊慶存〈宋代散文體裁樣式的開拓與創新〉，朱迎平〈宋代題跋文的勃興及其文化意義〉，羅斯寧〈論南宋小品文〉等，<sup>27</sup> 但觀念變化最大、爭論最多的還是對宋賦尤其是文賦的評價。

24 楊慶存，〈論北宋前期散文的流派與發展〉，《文學遺產》1995.2。

25 羅立剛，〈論歐蘇文人集團對「文統」建設的貢獻〉，《中國文學研究》1999.3。

26 郭予衡，〈南宋詩文的時代特點——《南宋文範》點校本序言〉，《北京師大學報》1990.3。

27 楊慶存，〈宋代散文體裁樣式的開拓與創新〉，《中國社會科學》1995.6；朱迎平，〈宋代題跋文的勃興及其文化意義〉，《文學遺產》2000.4；羅斯寧，〈論南宋小品文〉，《中山大學學報》1994.4。

關於宋賦的特徵與價值，曾棗莊〈論宋賦諸體〉<sup>28</sup>認為宋賦未必就遜於西漢、魏晉、隋唐。宋賦諸體（騷體賦、漢大賦、駢賦、律賦、文賦）皆備，賦之為用，實超過前人。宋賦與宋詩、宋詞、宋文一樣力求革新，不肯蹈襲前人。題材較前代更廣泛，並好在賦中發議論，往往以文為賦，語言散文化，由艱深華麗而變為平易流暢，追求理趣。至於宋賦的特徵，馬積高認為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以議論為宗。兩漢賦家皆尚鋪敘，魏晉以後代以抒情，唐賦漸以議論為主，宋人則大暢其體；第二，寫園亭齋室、樓臺亭閣、遊覽山水和題畫為內容的賦大為增加，這兩類賦構成宋賦主體部分，此外，描寫各地風土人情、地方官政績的賦也有所增加，反映出當時士大夫生活志趣較以前有所不同；第三，變艱深華麗語言為平易。<sup>29</sup>尹占華〈唐宋賦的詩化與散文化〉<sup>30</sup>認為唐宋賦家衍化了賦的形式，豐富了賦的表現手法，充實了賦的內容，當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賦不像賦了，因而使賦體文學呈現出一種迥異於漢賦的嶄新面貌。劉培〈論宋初辭賦的特徵〉<sup>31</sup>對宋初 70 年辭賦特徵、價值作出探討。文章認為：在社會人文諸因素的影響下，宋初辭賦出現以下一些特徵：1.沈潛內轉的時代精神影響著辭賦的審美趨向，具體表現在：宋初賦家回避社會矛盾，關注自身遭遇；追求情感的寧靜和平；追求幽約細美的情致；不喜鋪張揚厲、虛構誇張；2.重學風氣使宋初辭賦經歷了一個由淺麗流暢向典雅博奧的發展過程；3.儒學復興影響著辭賦的價值取向：使宋初賦家追蹤漢晉傳統，重新拾起賦見美刺的理論，關乎政治的頌美諷喻賦相當興盛，但多是重複前人說過的治亂之理，不像楊雄賦那樣具有鮮明的針對性；賦中議論成分大大增加；儒學對說理賦的發展具有促進作用；4.力求創新的變革精神促進了辭賦的新變：在風格方面，宋初辭賦家或追求雍容典雅，或追求質樸清便，

從多方革除五代文風；在體制方面，善於突破傳統的藩籬，使不同體制的賦互相吸收、互相融通，為文賦的出現開啓了方便之門；在語言方面，散文的語勢寓於駢偶當中，句式富於變化，句子長短不齊，體現出散體文的特徵。

關於宋代的文賦，曾棗莊〈論宋代文賦〉<sup>32</sup>指出：文賦是興起於唐而成熟於宋的新興賦體，它具有不同於其他賦體的特點，專尚於理而略於辭，有散文之風。它雖具有主客問答之類賦體共同特徵，但結構更富於變化，更重要的是多單行散句，雖間用騷體句、駢句，而多數句式為散句，並常用虛詞和聯接詞。文賦作品主要出現在北宋古文運動興起以後。但自歐、蘇創作文賦後，這種新興賦體並未成為宋以及宋以後賦的主體。《全宋文》所收宋賦約 1,400 篇，堪稱文賦者不足 100 篇，元明清三代作文賦者更少，作者認為其「根本原因是這種新興賦體未能為多數文人所接受」。尹占華〈唐宋賦的詩化與散文化〉認為宋賦散文化表現在三個方面：1.韻的疏密以及押韻與否很隨便；2.將賦用於說理、議論、記敘；3.不事雕琢，變艱深華美的語言為平易淺近，並將散文的氣勢注入其中。馬積高認為歐陽修和蘇軾對文賦的貢獻最大，〈秋聲賦〉和〈前赤壁賦〉為宋文賦的經典之作。他們的作品，採用和保留了設問、鋪張等漢賦的形式，又加入古文的筆法和句勢，行文多虛字、少對偶，句式長短錯落有致；雖然喜言理、多議論，但能將事、景、情、理融為一體，增加了敘事的形象性和抒情成分，形成了賦體的變革。但他也認為，「賦作為介於詩和散文之間的一種藝術形式，必須保持某些接近詩的特點，而訴諸感性的藝術形象，則是詩的基本特徵之一。宋代許多文賦作者基本上把這一特點破壞了，這就使他失去存在的價值」。<sup>33</sup>許總〈論宋代辭賦〉則對文賦予以充分肯定，他認為以歐、蘇為代

28 曾棗莊，〈論宋賦諸體〉，《陰山學刊》1999.1。

29 《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 384。

30 尹占華，〈唐宋賦的詩化與散文化〉，《西北師大學報》1999.1。

31 劉培，〈論宋初辭賦的特徵〉，《江海學刊》2004.2。

32 曾棗莊，〈論宋代文賦〉，《四川大學學報》2004.1。

33 同註 29。

表文賦，以唐宋古文氣勢打破唐、五代駢、律拘謹板澀結構，形成易於展示心靈的新體，能於極廣泛而極細微的題材中，闡發心靈，顯示追求理趣美的特徵。在形式結構方面，宋文賦以短篇巧構，隨心寄意，常專情於一事一物，多奇想之趣。辭藻運用方面則以清麗為宗，卻不乏勃鬱恣肆。宋人為賦，傳承賦體小品化的趨態，開創了短小自由的文賦形式。作者還認為，就賦體流變而言，由漢賦的重體物、晉、唐賦的或重情、或重景，到宋賦觀身達理、寫境沖淡，是從審美角度考察宋代新文賦歷史價值的重要線索。

#### 四、宋代古文運動研究

改革開放後的北宋古文運動研究主要涉及北宋古文運動發生發展研究、運動性質和成就研究、歐陽修、蘇軾在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太學體」和代表人物石介等人的研究。祝尚書的《北宋古文運動發展史》<sup>34</sup>和程傑《北宋詩文革新研究》<sup>35</sup>較為全面的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探討，還有一些論文對此進行專論。其中爭論較多的或與以往觀念改變較大的是：歐陽修反西崑與反太學體的關係；北宋古文運動是否在歐陽修手中完成，其領袖是歐還是蘇；對太學體及其代表人物石介的重新認識等。

##### （一）對太學體及其代表人物石介的重新認識

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北宋古文運動研究，相當一部分是集中在對「太學體」的重新考察性質認定上。祝尚書〈北宋「太學體」新論〉<sup>36</sup>對太學體的產生背景、演變過程、文體形態及張方平在反太學體中的作用進行了的考察。文章認為，太學體並非太學所孕育，更非石介一人能興風作浪，它經過了較長時間的演化，是特定歷史時代的產物，有它產生、發展和正式形成的「三

部曲」。一是景祐元年的科舉考試，這是起點；二是後來的滋生蔓延：「爾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三是太學建立之後石介的作用，是太學體的正式出籠，也是它的極盛時期。關於張方平對文體革新的貢獻，作者認為有二：一是最早反對太學體。張在打擊太學體中的作用，應該說是比較有力的。但限於歷史條件，比起後來歐陽修在嘉祐二年的行動，顯然有很多不足。二是向歐陽修薦舉「三蘇」。文章指出：由景祐「變體」到「太學體」，由張方平的鬥爭再到歐陽修的鬥爭——這就是宋仁宗時代文學蛻變與革新的雙重軌迹。關於太學體的性質，作者認為：第一，景祐變體是科舉考試的產物；第二，所謂太學體，乃是變體的官方化。太學體固然是指仁宗慶曆間流行於太學的文體，然而它的產生，卻有更深厚的歷史背景，時間也比創辦太學早得多，並非產生於太學以及國子監。石介任國子監直講不滿四年（1042-1045），僅僅短短時間，靠石介單槍匹馬地鼓吹，要形成一種影響廣泛、流行多年的文體，是不可想像的。因此，若把文風的敗壞全部歸罪於石介，則既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實。變體為什麼到慶曆間會化為太學體？除了石介的影響外，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它與慶曆時期學風有相當關係：當時整個知識界和官場都懷著浮躁的、急功近利的心態，文壇也必然大刮怪僻之風。可見，一種文體的流行，是社會各種影響力共同作用的結果。

黃寶華〈北宋古文運動發微〉<sup>37</sup>則認為：太學體的形成與時為國子監直講的石介、孫復有很大關係。他們以自己的教席地位推行文風復古，也促成以怪僻為宗的太學體滋生。起為糾正這種風氣的是石介的好友歐陽修。但直到嘉祐二年歐知貢舉時，才借助行政權力對這種文風進行一次清算，此時距石介去世已十二年。曾棗莊〈北宋古文運動的曲折過程〉<sup>38</sup>指出，嘉祐二年歐陽修知貢舉時所打擊的太學體，主要鋒芒是反對古文運動

34 祝尚書，《北宋古文運動發展史》（成都：巴蜀書社，1995）。

35 程傑，《北宋詩文革新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

36 祝尚書，〈北宋「太學體」新論〉，《四川大學學報》1999.3。

37 黃寶華，〈北宋古文運動發微〉，《上海師大學報》1995.4。

38 曾棗莊，〈北宋古文運動的曲折過程〉，《文學評論》1982.5。

中求深務奇的不良文風。歐陽修對當時這種號稱古文的「新弊」「太學體」很不滿意，認為一是水平太低，二是有類比韓文之弊；三是狂怪艱澀。葛曉音〈北宋詩文革新的曲折歷程〉一文也認為：太學體是石介、孫復、胡瑗等在太學當學官復古過當而造成的一種文體。它以力追古初、務求高遠的迂闊空談為內容，以行文力求怪僻為特徵。這一期間，歐陽修通過與後輩文人的交往，致力於糾正從太學流傳到社會上的生澀怪僻文風，並利用知貢舉的機會打擊太學體而獲得成功。<sup>39</sup>至於歐陽修排抑太學體的原因，不僅因為這種怪僻生澀的文風不合他喜尚平淡簡要的趣味，更重要的是其內容迂闊詭激與他「研窮六經旨」必須「究切當世之務」的一貫主張相悖。而這次鬥爭的意義也不止使文風由怪變易，從此建立起平易流暢、委曲婉轉的散文風格，而且還有力地扭轉了古文復興之後脫離社會現實的傾向。使北宋詩文革新運動避免了重蹈中唐古文運動的覆轍。因此作者認為這場排抑太學體的鬥爭與反對西崑體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sup>40</sup>

## （二）北宋古文運動性質和成就

張國俊、張瑞年〈古文運動是形成藝術散文的運動——對唐宋古文運動的再認識〉<sup>41</sup>認為宋代古文運動「與唐代古文運動一樣，既是一場儒學復興運動，又是一場文章形式的革新運動，是一場形成藝術散文的運動。它有意於儒學，有意於文章，無意於藝術散文，然而卻意外地收穫於藝術散文」。作者在文章中回溯了中國藝術散文的發展歷程，認為中國藝術散文從先秦結胎到宋古文運動，中間經歷了幾多曲折，由簡趨繁再由繁變簡，直到文風曉暢平易的宋代古文產生，才最後完成其形式的確立。在這個變化過程中，居於主導因素的是語言形式的駢散互變——駢體與散體的互補互融及相互抵觸，這是藝術散文的形式演變的內在推動力。黃寶

華〈北宋古文運動發微〉認為這是一場文學革新運動。文章批評了「一般文學史著作都將這場革新運動作簡單化的論述，把它歸為儒學復興的產物，古文派對駢文派的勝利。這場鬥爭似乎集中表現為道學家對西崑派的批判，歐陽修和蘇軾也採取了同樣的立場」。作者認為：實際上儒學復興對文學革新既有促進也有阻遏的複雜情況，在其過程中既有古文派反對駢文浮豔文風的批判，又有古文派內部糾正險怪文風的鬥爭，後者的意義絕不亞於前者。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後者，也就談不上北宋文學革新的勝利，很可能重蹈唐代古文運動的覆轍。暢孝昌〈唐宋古文運動復古實質初探〉<sup>42</sup>則認為唐宋古文運動是復古而不是革新。「不僅鮮明地張出復古旗幟，而且其實質也在於復古」，其領袖對革新都諱莫如深。古文運動的實質就是復興儒學的社會思想運動。從思想上看，伴隨當時復興儒學的思想運動，摧毀了魏晉以後新生的尊重人的個性的玄學，獨尊了復古的儒學，不能為革新；從文學上看，古文對駢文的勝利乃文言戰勝口語，古代句法、辭彙戰勝時下流行的語彙，只能為復古。另外，唐宋古文運動也是對魏晉南北朝文學「自覺時代」的反動和倒退：一是終止了魏晉以來未能完成的「文筆之辨」，使文學觀念趨向模糊；二是貶低文學，使魏晉時幾乎獨立的文學，又成儒道的附庸和工具；三是從「化成天下」角度有意模糊文學觀念。

相當一批論文是從唐宋古文運動比較角度來肯定宋代古文運動成就，如劉衍〈從唐宋兩次古文運動看歐陽修革新傳統散文理論的貢獻〉<sup>43</sup>對唐宋兩次古文運動作一比較，從而肯定歐陽修對宋代古文運動的貢獻。文章認為：這兩次古文運動就其產生背景、革新對象、革新宗旨乃至復古口號都頗為相似，兩次運動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也都得到學術界的認同。但韓、柳所期望的最終結果，卻是悲劇性的：他的身後卻是駢文復熾，其弟子無力抗衡，甚至學步不成，反而走上求深而至於迂，

39 葛曉音，〈北宋詩文革新的曲折歷程〉，《中國社會科學》1989.2。

40 《歐陽修排抑「太學體」新探》，《北京大學學報》1985.3。

41 張國俊、張瑞年，〈古文運動是形成藝術散文的運動——對唐宋古文運動的再認識〉，《陝西師大學報》2000.1。

42 暢孝昌，〈唐宋古文運動復古實質初探〉，《太原師院學報》2002.4。

43 劉衍，〈從唐宋兩次古文運動看歐陽修革新傳統散文理論的貢獻〉，《中國文學研究》1998.3。

務奇而至於怪的歧途；歐、蘇所期望的最終結果，卻是喜劇性的，其革新成果被繼承者們發揚光大，並澤及元明清各代。究其原因，除時代、政治、文化思潮等制約因素外，也與指導運動的理論有關。作者認為，歐陽修的理論比韓愈通達，並具有前瞻性、開放性、科學性。他在「道」與「文」、駢與散、繼承與革新等方面所作的闡釋，是系統的、成熟的，由他奠定的傳統散文的新的風神格調，有承傳價值。洪本健〈論唐宋古文運動的差異〉<sup>44</sup>認為唐宋古文運動是十分曲折而漫長的歷程，由韓、柳掀起第一個高潮的中唐至歐、蘇掀起第二個高潮的北宋中葉，相距二百多年。以推翻駢文的統治、樹立散文正宗地位為主旨的古文運動，何以跨越如此漫長的歲月才取得最後的勝利呢？顯而易見的原因是，北宋古文運動具備中唐古文運動所不曾擁有的優勢。換言之，兩代古文運動存在著不少的差異。

### （三）歐、蘇在北宋古文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

關於歐陽修在北宋詩文革新中的巨大作用，學者們並無爭論，但北宋古文運動是否在歐陽修手中完成，其領袖是歐還是蘇？在改革開放後，學者基本上有三種看法。一是相當一部分學者對此持肯定態度，如上面引述過的葛曉音〈北宋詩文革新的曲折歷程〉，陳平原〈唐宋古文運動述略〉皆持此觀點；二是認為歐陽修和蘇軾是兩個發展階段的不同的盟主，如楊慶存《宋代散文研究》即認為「歐蘇是先後領袖群彥的盟主地位」「歐蘇先後輝聯，分別在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執文壇牛耳」。第三種是認為蘇軾才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真正完成者，才是北宋詩文革新的真正領袖。朱靖華〈蘇軾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真正完成者〉，姜書閣〈蘇軾在宋代文學革新中的領袖地位〉皆持此觀點。<sup>45</sup>朱著將北宋詩文革新運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0世紀70年代到

10世紀末，柳開等人倡復古道；第二階段是11世紀初到11世紀中葉，歐陽修等人從理論上矯正了運動初期重道輕文傾向，並在詩文創作上樹立起革新的楷模，取得初步成效；第三階段是11世紀中葉到11世紀末，以蘇軾為代表，在理論和創作上除舊布新，廓清了西崑派流毒，促成了創作的繁榮，完成了歷史使命。作者認為歐陽修是文學革新中一位傑出領袖，但他在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上都有著深刻的矛盾，晚年甚至大肆吹捧起西崑體的作家作品來，轉向了保守的立場，其消極影響是難以估量的。姜文認為「歐陽修既不是詩文革新的領導者，更不能成為詩文革新的領袖」，其原因是歐陽修「學古文較諸友為遲」。且一直是以韓愈為師，文論上基本上沒有什麼創建，對西崑派的批評也沒有超出宋初王禹偁、柳開等人的範圍甚至還不及他們的某些批評痛切。因此作者認為歐陽修的主張只是復古，看不出多少個新的內容。對此，鄭孟彤〈歐陽修在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王綺珍〈論歐陽修在宋代詩文革新中的領袖地位——兼與姜書閣商榷〉皆提出不同看法。<sup>46</sup>鄭文對姜的觀點逐一反駁：第一，歐陽修吸收了北宋前期范仲淹、柳開等人的革新主張，並利用自己政治上和文學上的崇高地位大力倡導新古文，終於形成聲勢浩大的詩文革新運動，這種地位和努力，是無人企及的；第二，利用知貢舉反對艱澀險怪的大學體，倡導平易流暢的新古文，並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第三，注意培植人才，壯大革新隊伍，曾鞏、王安石、蘇軾等北宋詩文革新的關鍵人物皆出其門下；第四，倡導革新理論，以他為首的北宋詩文革新創作隊伍在其指導下，其創作實踐也起了很大示範作用。王文指出：歐陽修的領袖地位在宋代即以確立，推舉他的幾乎全是這場革新運動的參與者，其中尤以蘇軾具有代表性。歐陽修領袖地位的確立是詩文革新運動的歷史必然，他解決了詩文革新的一系

44 洪本健，〈論唐宋古文運動的差異〉，《周口師專學報》1997.2。

45 朱靖華，〈蘇軾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真正完成者〉，《蘇軾新論》（濟南：齊魯書社，1983）；姜書閣，〈蘇軾在宋代文學革新中的領袖地位〉，《文學遺產》1986.3。

46 鄭孟彤，〈歐陽修在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學遺產》1987.6；王綺珍，〈論歐陽修在宋代詩文革新中的領袖地位——兼與姜書閣商榷〉，《文藝理論家》1987.1。

列重大理論問題；其創作有不容貶低的藝術成就和革新精神。

對於蘇軾在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前面論述歐陽修時已經提及，這裏要補充的是還有人認為蘇軾的散文創作雖是宋代古文運動的主力，但對古文運動的態度則是矛盾的，對詩文革新是反對的，如沈元林〈蘇軾在北宋古文運動中的矛盾心態〉<sup>47</sup>認為：一方面，他受家庭薰陶，一生愛古文又善寫古文，平易暢達的古文更讓他獲得榮登榜首的殊榮；但另一方面他又主張依舊制、行舊法，維持舊的以詩賦取士的貢舉制，行動上更是終身沈潛於詩詞文賦書畫之中。作者的結論是：「看來蘇軾似乎沒有把科舉取士制度與古文運動的成敗聯繫在一起，他淡忘了自己曾以平易暢達的古文獲得榮登榜首的殊遇，他也沒有想到士子群起仿習古文蔚然成風，會使自己作品身價大增。他只是執著的站在守舊立場，反對王安石的科舉革新，極力倡導恢復以詩賦取士。然而他最終還是失敗了。與他在古文運動中反對革新的失敗形成鮮明對比，他的文章——宋代古文運動的主力——則成為文學史上所謂蘇海的洋洋大觀。這是他創作實踐的勝利，當然也是宋代古文運動的勝利」。曾棗莊則認為蘇軾反對王安石那種「好使人同己」的經義時文，屬於古文運動內部分歧。作者充分肯定蘇軾在北宋古文運動中的功績：「從宋王朝建立到歐陽修嘉祐二年知貢舉，將近經過了一百年，古文運動的成績並不顯著。原因很複雜，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沒有大量的堪稱典範的古文來取代四六文和怪澀的『古文』。

嘉祐以後文風大變，歐陽修對凡為險怪奇澀之文者輒黜，當然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歐、曾、王、蘇在創作上拿出了足稱典範的大量作品。特別是三蘇父子的文章對改變當時的文風起了很大的作用」。<sup>48</sup>

## 五、結 論

以上對20世紀80年代大陸改革開放後的宋文研究作一總體回顧，涉及宋文總集和別集的整理狀況；宋文的總體研究、分期、分段和類別研究；北宋古文運動的發生與發展，性質和成就，歐、蘇在北宋古文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諸多問題。至於作家、作品研究，限於篇幅這裏就無法討論。中國大陸宋代文學研究態勢，總的來說是宋詩、宋人小說研究不如宋詞，宋文研究又不如宋詩和宋人小說。自80年代以來這種狀況雖有改觀，但總體格局仍未改變。宋文研究與宋詞宋人小說、宋詩研究的規模、隊伍和進展速度相比，還存在相當的差距。如果說，宋詞和宋詩研究正在形成學科規模，宋文研究則連個學科概念也沒有達到，專家寥寥、著述不多，難以形成規模，至於像宋詞的詞風、詞體之爭，宋詩、唐詩特徵、優劣之爭等那種大規模的、激烈的、吸引學界多方關注的討論和爭論還沒有發生過。另外在學術層次、學術觀念、研究角度、研究深度以及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等方面都還急待加強和扶植。但也正因為處於起步拓展階段，天地極為寬闊，為有志於此的學人提供了施展身手的廣闊舞臺。

47 沈元林，〈蘇軾在北宋古文運動中的矛盾心態〉，《社會科學學報》1998.2。

48 《北宋古文運動的曲折過程》，《文學評論》1982.5。